

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能够决定一个文学文本的风格与意象。利用你所选  
修的两部作品来讨论这个说法 —— 《倾城之恋》和舒婷诗歌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变迁，社会中有着独属于该时间段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主要体现在历史形态、历史事件对人们思维的影响上，而文化语境更多注重文化习俗、社会规范上。这两者是该时代下作者创作背景的具体表现，因此，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作品的风格定位与意象定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和舒婷，其作品的风格与意象均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倾城之恋》和舒婷的诗歌有着或荒凉虚无，或积极温柔的不同的写作风格底色。

《倾城之恋》创作的背景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在历史语境上，当时上海正处于战乱动荡的时代，统治势力各自博弈，个人则面临艰难的生存困境。从文化语境里，新旧思想交替变革，原有的封建礼教开始逐渐瓦解，但对女性仍有较大束缚。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倾城之恋》的风格荒凉的、苍白的，甚至是虚无的。白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范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因而即便是张爱玲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喜剧”结局，也并没有削弱作品的苍凉感。白流苏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倾城”是这段爱情的底色，但“倾城”本身正体现了《倾城之恋》的苍凉虚无的风格。曾经繁华无比的香港沦为了遍地断壁颓垣的“死的城市”，炮火连天，人们朝不保夕：“轰天阵地一声响，整个世界黑了下來，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在战火面前，人是如此渺小和无力，无论身份、

地位，都恍若微尘，不能自主。曾经的歌舞升平成为了遥远的梦，任何看似天长地久的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消失在悲凉的虚空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弥漫着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以及将无法避免的女人的辛酸命运。荒凉与虚无是动乱的历史语境下的张爱玲的风格。

舒婷的诗歌兴盛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当时的“文革”浩劫梦魇的结束、思想大解放、艺术民主的提出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文化方面，文学快速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派繁荣现象。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制度的完善让女性有了独立的地位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开放给女性写作也提供了很多的话语空间。在积极宽松，文艺复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舒婷的诗歌风格大多积极开阔，乐观温柔，饱含着对他人已经对家国的“爱”。如“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碳。”“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只要夜里风/风改变思绪的方向/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会回来/在你肩旁平静地说/兄弟 我在这儿”均展现出大方积极、温柔向上的态度。又如“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家国的爱，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风格。在舒婷的诗作中，即使是那些以批判和控诉为基调的诗章，也暗自涌动着温柔的暖流。如《风暴过去之后——纪念“渤海二号”钻井船遇难的七十二名同志》一诗中，诗人在悲愤之余呼吁道：“我希望 汽笛召唤我时/妈妈不必为我牵挂忧虑/我希望 我受到的待遇/不要使孩子的心灵畸曲/我希望 我活着并且劳动/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我希望 若是我死了/再不会有人

的良心为之颤栗/……”这些愤激的诗句深切地透露出积极向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诗人温暖积极的风格。这与张爱玲的悲伤苍凉的底色风格全然不同。

在意象方面，《倾城之恋》与舒婷的诗歌都选择了符合当时历史与文化语境的意象，在意象的色调、意象意蕴的选择等方面，均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

在动荡苍凉的历史语境下，《倾城之恋》的意象偏向阴冷与苍凉。如“镜子”这一意象，在行文中蕴含有虚无飘渺，苍凉冷淡之意。如流苏尚在白公馆时，因家人的嘲讽而心灰意冷，扑到穿衣镜上打量自己。在发现自己的青春容貌还能用来做赌注时，流苏阴阴地、不怀好意地笑了。镜子中的流苏已经不再是仁懦的大家闺秀，她是一个在绝望中打起精神准备替自己挣一个未来的复仇者。虚无冷淡的镜子映射着属于那个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动荡、博弈和算计。流苏第二次赴港，柳原在她的房间里吻她，把她推到镜子上：“这是他第一次吻她……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细了，始终不肯冒失……流苏觉得她溜溜走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镜子的冰冷暗示着感情的不单纯性，为这段罗曼蒂克的拥吻渲染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又如“胡琴”这一意象，“听着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胡琴出现在文本的首尾，为全文奠定了苍凉的基调。除此之外，能体现衰亡的历史语境的还有一系列衰败的意象，如“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一系列阴冷、苍凉、衰败的意象正是动荡衰败的历史语境的映衬。

相比之下，舒婷的诗歌大量使用暖色调的、积极开阔的意象，并以部分意

象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如在诗歌《船》当中，“纵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文中将人类的命运比喻成漂泊的船只，在文化大革命的混沌之中，人们命途多舛、颠沛流离，将仿佛无依无靠的船只；并且人与人之间就像船与船之间隔着广阔的水域，虽然彼此相望但相互漠然，失去了昔日的友好和谐，作者通过间接的手法呼吁人们重拾人性真善美，重建和谐友爱的温暖社会。这一意象的使用直接受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在新时代到来之后，社会生活出现的新的转机和新气象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心态，因而诗人舒婷才那样兴奋地喊出“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这样如此激动人心的诗句。“胚芽”“起跑线”“绯红色”“黎明”等意象都充满了希望与对新的时代阶段的向往。也正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系列政治转机才使诗人的心态如此乐观、积极和向上。此外，舒婷的作品还大量地选用“花朵”“树”“星月”“船”“帆”等这些带有暖色调的意象。这些积极明媚的意象正是高压的历史结束，思想解放、文艺复苏的时代映衬。

文艺复兴造就了莎士比亚，富庶统一的唐朝造就了盛唐气象。毋庸置疑，文学的意象与风格一贯与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文学作品的意象与风格。

《倾城之恋》与舒婷的诗歌都体现出了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映衬。但同时也应注意，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并非绝对的限制与决定。作者的个人的经历与写作偏好等因素也会对文学作品意象与风格产生影响。如张爱玲与舒婷均是女性作家，因此均更偏好女性意象；又如与舒婷几乎同时代的北岛，也有大量阴暗底色的作品。因此，在讨论作品的意象与风格时，除历史与文化语境外，也应更广泛地考

考虑到更多的因素。